



良心茶遊記

# 駝峰上的香港英雄(上)

據有關記載，除了陳文寬和潘國定以外，還有多位香港人先後參與過駝峰空運。其中有一位是香港的名人之後，他叫龍啟明。龍啟明1923年出生於香港，他祖籍廣東順德，是順德清暉園主龍廷槐的第五代傳人。他的父親龍朝傑跟孫中山是同學，擔任過香港電訊司副司長和香港華員會（相當於工會）會長。順德清暉園龍氏家族是嶺南地區歷史悠久的名門望族，以詩書傳家、耕讀傳世為家風，在明清時期科舉中家族產生6名進士和10多位舉人，被譽為「一門六進士」。龍氏家族不僅注重教育修養，還積極投身地方公益慈善活動，捐資支持學子科考，並積極推動嶺南文化發展。龍氏家族在順德的產業起源於清代乾隆年間，龍氏21世祖龍應時中進士後購得明末狀元黃士俊的舊園，逐步發展為私家園林，成為嶺南四大名園之一、中國十大名園之一。新中國成立後，清暉園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接待過多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1992年南巡時曾在清暉園逗留並發表了重要講話。

龍啟明生在香港，長在香港，他小學中學都是在香港讀書，畢業於香港英皇學校。1941年日本佔領香港時，龍啟明已經考進香港政府工學院（現在的香港理工大學）電機工程系。香港淪陷後，原本擔任香港電訊司副司長的龍朝傑因拒絕為日本人工作而失業，不僅失去了豐厚的收入，而且遭到日本人百般刁難。日軍隔三岔五就到家裏搜查，敲詐勒索。次年6月，當日本佔領軍開始在香港拉壯丁時，龍朝傑嚇得讓龍啟明和哥哥龍啟昌趕快逃離香港。臨別時，龍朝傑寫下「國仇未報心難死，忍作尋常泣別聲」條幅為兄弟倆送行，這是廖仲愷的名言，廖仲愷夫人何香凝書贈龍朝傑。

龍啟明的人生由此改變。在哥哥離開香港一周後，龍啟明和幾個同學一起逃到了澳門，當時澳門還是中立地區。在澳門聽說華僑學生到內地讀書不需要交錢，還有飯吃，於是龍啟明就想回到內地繼續讀書。他和兩個同學一起先走到當時的廣州灣，隨後又步行七天到了廣西玉林，再轉汽車、火車，差不多經一個多月才到了桂林，那時已經是1942年6月。在桂林，龍啟明還真考取了廣西大學，但沒想到讀大學並非免費，要交2,000多塊錢。他交不起錢，就放棄了讀大學。18歲的龍啟明失望至極，和同學無聊地在桂林街

頭漫無目的瞎逛。

1942年的時候，桂林成為從香港向內地轉移愛國人士和文化精英的重要中轉站，聚集了很多逃難來的香港人，因此桂林當時被稱作「小香港」。據龍啟明回憶，他們和許多逃難到桂林的香港青年都住在當地的青年會裏，5毛錢住一晚，7毛錢一頓飯。他們在青年會裏偶然看到報紙上刊登有中國政府航空委員會招收留美空軍的消息，正愁生活沒有着落的他們就想去搏一搏。龍啟明賣了自己一些衣服才湊夠400元報名費。結果他和3個同學都被錄取了。隨後他們被送到重慶去正式登記報到，然後又從重慶到了昆明航校接受訓練。

初到航校，龍啟明就表現出了驚人的飛行天賦。他在昆明航校初級培訓班和後來的印度美軍中級培訓班都提前畢業。1943年初，龍啟明被送往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接受高級培訓，4個月後就以優異成績獲得了準飛行員的資格。由於國內戰事吃緊，盟軍飛行員緊缺，龍啟明提前回國投入抗戰，被分到當時最危險的駝峰航線駕駛運輸機。剛剛20歲的龍啟明在「死亡航線」上開始了金戈鐵馬的空中戰鬥生涯。據龍啟明回憶，他到印度參加駝峰空運時，駝峰航線空運任務非常緊急繁重。當時飛行人員異常缺乏，本應三人飛的機組只有兩人飛，每天一個來回，從昆明巫家壩機場到印度阿薩姆省的汀江或克魯卡，有時候一天甚至要飛一個半來回。他們在印度基地的100多架飛機，每天都要在昆明和印度之間往返一個來回，6小時內飛行700多公里。

在駝峰航線上，險峻高山、惡劣天氣和日本戰機是他們的三大敵人。航線上幾乎天天都要摔飛機。和龍啟明一起參訓的中國人有28名，後來在駝峰航線上一起參加空運的，也有幾十個中國人，大家見面都很親切。不少戰友在互不知道姓名的時候就犧牲了，有些朋友今天一起吃飯，明天就不見了。抗戰勝利時，和龍啟明一起參訓和一起參加駝峰空運的夥伴只剩下8人。講起飛越駝峰航線是什麼感覺？龍啟明在60年後還心有餘悸地說：「飛上駝峰航線，那就像是在漆黑的夜裏，讓你閉着眼跑百米衝刺一樣。一直飛！要麼到達目的地，要麼去見上帝！」或許是命運的偏愛，龍啟明多次死裏逃生，得了個外號叫「幸運星」。在短短的一年間，龍啟明在駝峰航



●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龍啟明從昆明巫家壩機場趕到昆明市區，帶妻兒去照相館拍了這張紀念照。

作者供圖

線上飛行了2,100多個小時。

由於在駝峰航線的優異表現，1944年6月，龍啟明等6名優秀中國飛行員被選拔進入陳納德將軍率領的美國第十四航空隊，龍啟明成為飛虎隊轟炸機最年輕的飛行員。龍啟明被派駐印度加爾各答負責轟炸緬甸臘戍、密支那、仰光等區域的日軍目標，任務是從空中切斷日軍的後援。也在那一年（1944年），龍啟明父母在從香港到內地途中被日軍炸死，11歲的弟弟僥倖逃脫。國恨家仇更激起了龍啟明在戰鬥中英勇無畏！龍啟明在飛虎隊積極請戰，每當有警報響起，他總是第一個跳上飛機，力爭第一個與敵機交手。在轟炸日軍目標時，他千方百計速戰近戰，力求精確直接打擊日本法西斯。有次在轟炸緬甸一個日軍後勤倉庫時，龍啟明駕駛B-25重型轟炸機逼近目標上空，他不顧飛行投彈不能低於1,000米極限的要求，從3,000米高空直落俯衝到離目標200米至300米的高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低飛連續投彈，把日軍基地炸成一片火海，返回着陸後才發現機尾被日軍高射機槍打了14個洞之多。

讓龍啟明感到最輝煌、最暢快的一刻，是在日本投降後的第10天，1945年8月25日，他和轟炸機分隊隊長希爾少校從四川梁山縣（今重慶梁平縣）起飛，到武漢接收被日軍侵佔的武漢機場。舉行受降儀式後，他奉命押送10名「神秘日軍戰犯」到上海美軍總部，轉交軍事法庭審判。據龍啟明回憶，他後來才知道了那10名日軍戰犯的罪行。原來在抗戰勝利前夕，美軍發現日軍拍攝了一部宣傳「美國人在中國不受歡迎」的虛假宣傳片。宣傳片暴露了日軍自己殘殺美國飛行員的血腥暴行：日軍擊落了一架美軍飛機，活捉了美軍飛行員。一批日軍士兵穿上中國軍人的衣服，冒充中國軍人殘酷毆打美軍飛行員，最後將汽油澆在美國飛行員身上把他活活燒死。美軍對拍攝這部宣傳片的日軍進行了深入調查，抓捕到10名參與的日軍軍官，官銜從大佐、校官到上尉等都有。龍啟明後來在自傳中寫道：「這是我一生中最暢快的飛行！」

川西南的冬天格外寒冷，霜風不時颳過屋簷。這讓我想起了牟河壩的冬天，那些由火籠子陪度過的童年時光。火籠子在家鄉洪雅，是烤火取暖的工具，尤其在鄉村。火籠子是用老竹子的幾條編織的，形狀有點像竹籃，又有點像燈籠。有的編得粗糙，有的編得美觀，裏面都安放着一個陶瓷燒的瓦鉢，放上木炭，提在手裏，像握着時光的溫度。

我家有兩個火籠子，一大一小，都是父親請人用三年老茨竹編製的。每天天不亮，母親就會蹲在灶膛前，用火鏟把通紅的木炭鏟進瓦鉢，再鋪上一層溫熱的灶灰壓實，炭火在灰下悄悄燃着，不冒煙，卻不斷散出暖意，去上學時，母親就叫我提着小火籠子去。晚上，母親會在我睡了以後，把我的襪衣襪褲洗了，擰乾，搭在那個大火籠子上，等我早上醒來時，衣物早已烘乾，穿在身上格外暖和。

牟河壩的冬天是寒冷的。田野上寒風颼颼，空氣中寒風逼人，走在上學的路上，山風像刀子似的颶着我們的小臉。因為提着一個小火籠子，我們也不懼寒冷。遇到風兒吹來，我們就把火籠子捲在懷裏，側身慢慢挪步。到了學校，上課時我們把火籠子放在課桌下，腳挨着溫熱，手冷了就伸下去烤一烤，身子一暖和，學習更有勁了。教室裏四面漏風，有時候不知誰的火籠子起了煙，嗆得人直咳嗽，老師便叫我們趕快提出去處理巴適（四川方言：好）。

火籠子不僅帶給我們溫暖，還帶給我們童年的歡樂。放學回家後，我會偷一個小紅薯或幾顆胡豆黃豆，埋在火炭灰裏，看着灰堆慢慢鼓起小泡，聞着越來越濃的香氣，等不及熟透，就用樹枝扒拉出來。紅薯外皮焦黑，掰開後冒着熱氣，一口咬下去，再燙也不鬆口；胡豆黃豆「劈啪」炸開，嚼在嘴裏脆生生的。偶爾火星濺到衣角，燒出個小洞，母親回來發現了，免不了罵幾句打幾下，可下次還是忍不住要擺弄這些小樂趣。

冬天裏，村裏有一些上了年紀的老婆婆，手裏提着個火籠子走村串戶，和鄰居拉家常擺龍門陣。她們把火籠夾在腿間，雙手攏在袖子裏，話語隨着熱氣散開，家長裏短都浸着溫度。下雪天，睡覺前，母親會把火籠子周圍擦乾淨，放進我的被窩烘一會兒，再輕輕提走，被窩裏那殘留的暖意，能伴着我一覺睡到大天亮。

後來走出牟河壩參加了工作，家裏有了烤火爐、電熱毯和空調，慢慢忘掉了火籠子。不久前回到老家，在大嫂老屋牆角看到一個蒙着灰塵、竹篾條有些乾枯發霉、瓦鉢也裂了一道細紋的竹編火籠子，這使我想起了童年的冬天，想起了火籠子，想起了通紅的火炭，想起了母親烘暖的衣物，也想起灶灰裏香甜的紅薯和胡豆黃豆。那不僅僅是童年最珍貴的記憶，也是故鄉最溫暖的底色。

●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 文化解碼

# 藏經洞文獻研究的百年回望

1900年之前，它只是一個殘破、空寂的洞窟，彷彿時間在此停滯了一千年，1900年之後，它忽然成為世界學術的一個焦點，無數發黃的、脆弱的紙頁，色彩斑駁的絹帛，從密藏中被重新喚醒，也由此開啟了一段複雜而曲折的學術史——關於發現、掠奪、研究、反思與重生。

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踏入敦煌。他像一位探險者，將約一萬四千件寫本與絹畫帶往倫敦。那些文獻在大英圖書館被重新編號、攤平、裝訂，成為西方學術體系中的研究對象。最初學者們以冷靜而克制的方式，為這些材料建立目錄、校勘文本，從地理記載到梵文寫經的殘頁、最古老的星象圖、精美絲綢上的繪畫，一條條絲綢之路的脈絡在研究中被重新勾勒。敦煌也由此進入西方人建構的全球歷史地理與語言學的坐標系。

一年後，法國人伯希和抵達。精通多國語言的他並不貪多，而是在洞中「挑選」最具研究價值的文本。那些漢語、粟特文、回鶻文、于闐文寫本被帶到巴黎，進入法國國家圖書館。法國學者精細地剖開這些文字背後的秘密，從摩尼教、景教文獻中，看到唐代宗教世界的多聲部共存，也從一紙契約、一冊賬簿、一份離婚文件、一件法律文書、一個妻子的信件中讀出普通人生如何生活、交易、信仰……敦煌不再只是宗教的中心，而是一個活着的中古時代人類多元融合的社會。

幾乎同時，日本學界也在遠望敦煌。受「東方文化源流」思想的驅動，日本學者以近乎執拗的耐心，對佛經、法制文書，變文俗講進行系統整理。他們在疑偽經中辨認中國佛教的自我生成，在殘缺的律令文書裏還原唐代法律運行的細節，在變文的節奏中，重建中國俗文學的源頭。敦煌，成為理解中古中國的一把鑰匙。他們也曾驕傲的說過「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而彼時的中國學者，多數只能在案頭通過零散的照片與拓片「旁聽」這場學術盛宴。羅振玉、王國維、陳寅恪等開始研究開拓，也充滿着憂傷的情思，說出了「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的語句。

新中國成立後，局面緩慢改變。莫高窟被列為國家重點保護單位，敦煌學在本土重新起步。這一時期，沒有宏大的理論，

只有艱難的基礎工程。《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的編纂，像是在廢墟上重新丈量土地。向達、王重民、姜亮夫等學者，一磚一瓦地搭建起中國敦煌學的基本框架。只是，那些散落海外的文獻，可望而不可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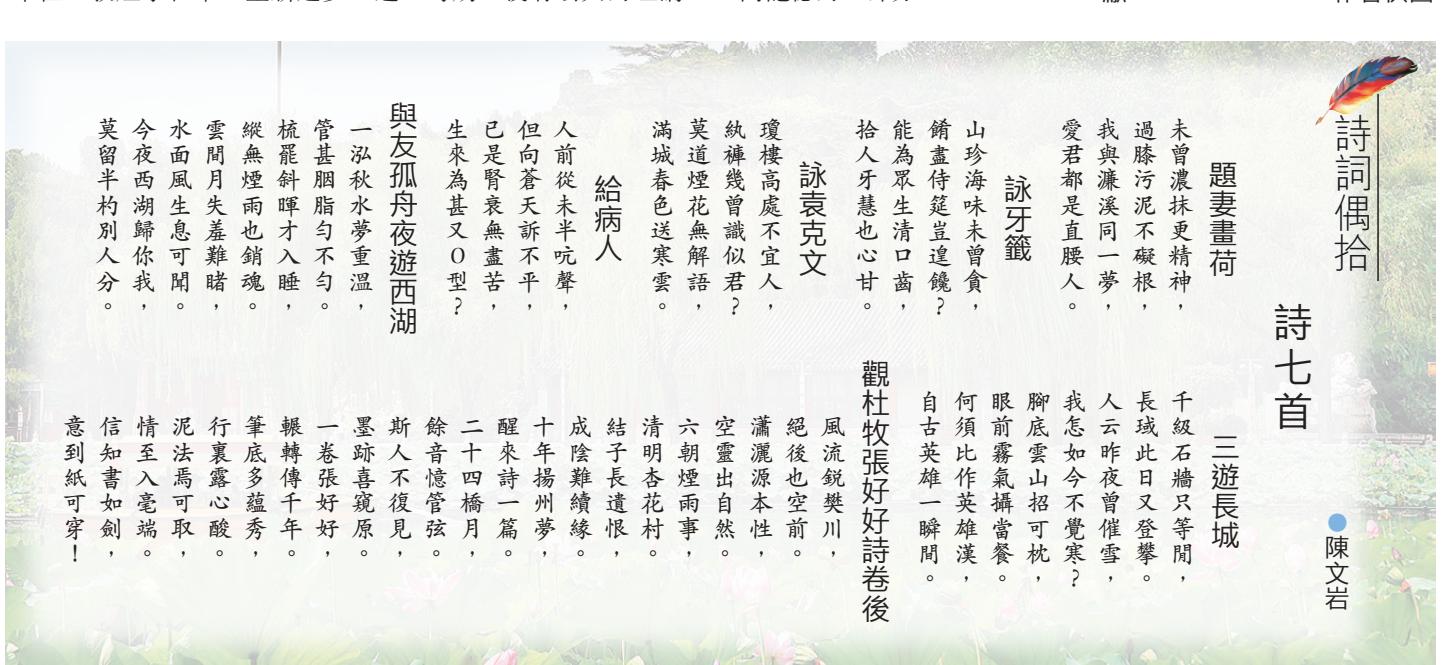
真正的轉折，出現在二十世紀末。隨着改革開放，文獻開始「回歸」——不是以實物，而是以圖像和數據的形式。高清影像跨越國界，《英藏》《法藏》《俄藏》《國圖藏》敦煌文獻相繼出版，世界第一次在學術意義上「看見」了完整的藏經洞。各國的研究傳統開始交匯：英國引領數字化與修復標準，法國深化多語言釋讀與社會分析，日本將圖像與文本並置細讀，中國學者則在浩瀚漢文文書中，重建地方政權、社會結構與制度運作。敦煌學，真正成為一門全球協作的學問。

今天，新的時代正在到來。

人工智能參與識字、綴合與主題分析，多光譜成像喚醒褪色的批註，DNA技術追溯紙張與皮革的來源。一幅絹畫上的供養人姓名，能夠與契約、題名、墓葬圖像相互勾連，一個普通人的生命軌跡，在數據網絡中重新浮現。敦煌學，正在從「研究對象」轉變為理解歐亞文明交流的窗口與載體，敦煌研究院也成為全球敦煌學研究中心和高地。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今天也在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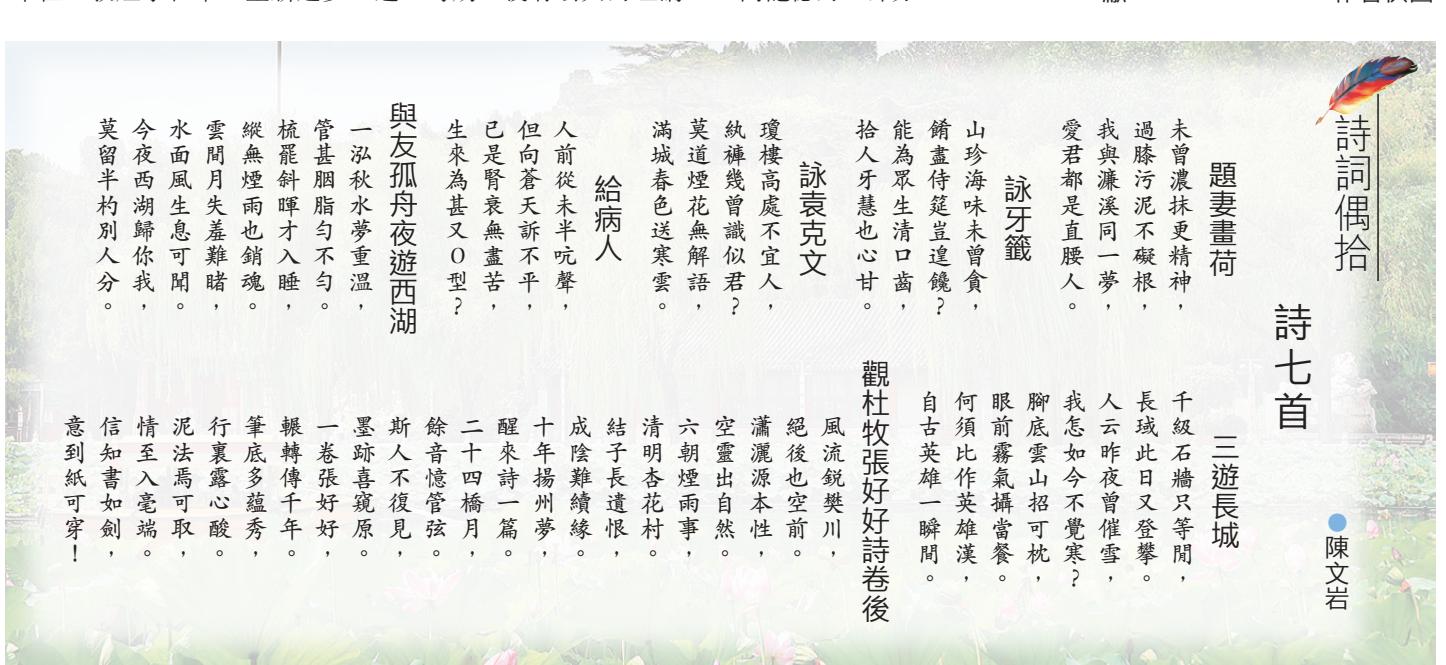
百年回望，藏經洞的故事，早已超越了「傷心史」的敘述。它見證了學術的憂愁，也閃亮着國際合作之路。當巴黎、倫敦、京都、北京、香港的學者，圍繞着千年前脆弱的紙張共同研討時，敦煌不再屬於某一個國家，而成為人類共同記憶的一部分。

●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敦煌文獻  
作者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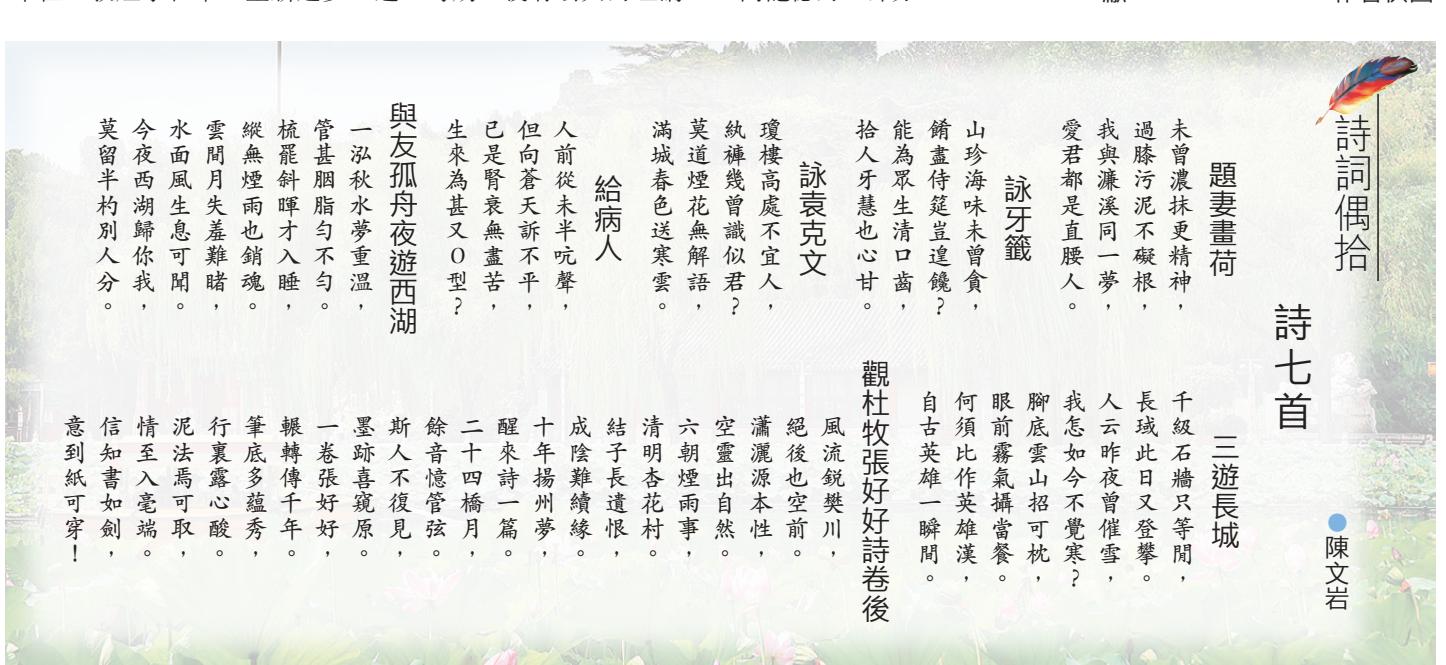
詩詞偶拾

● 陳文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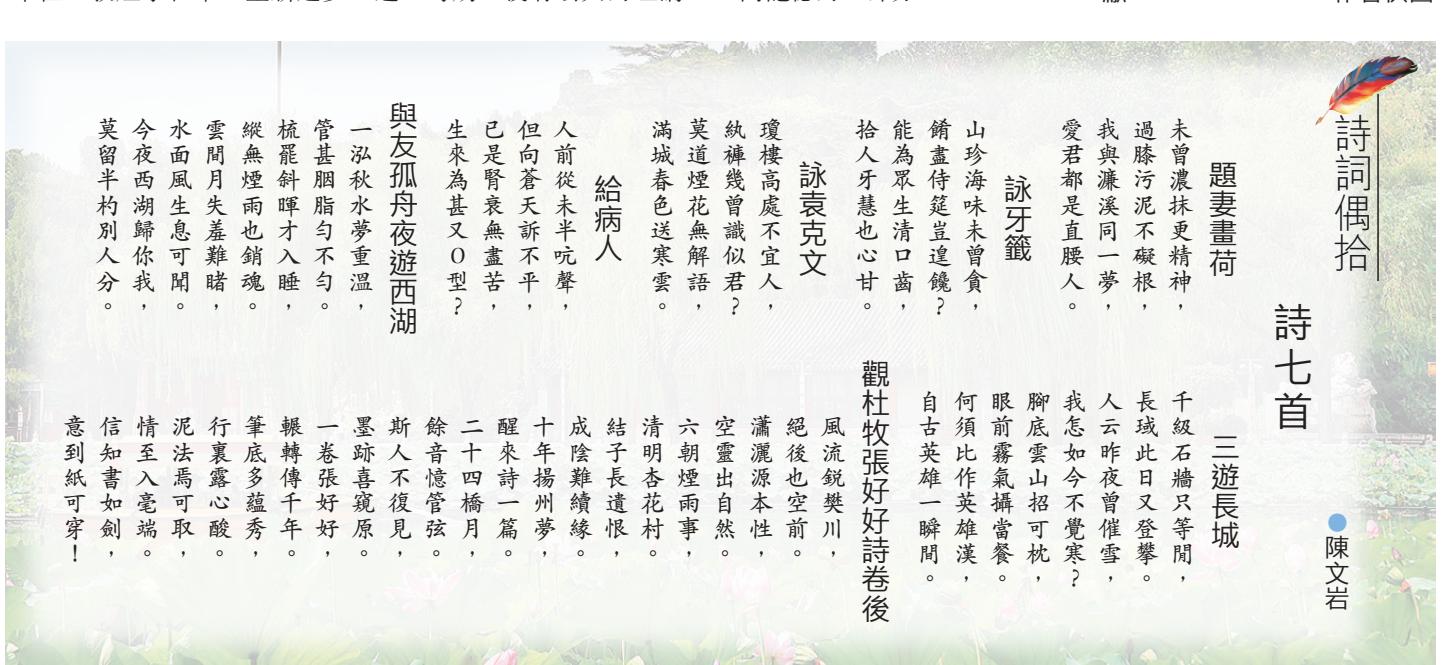
詩詞偶拾

● 陳文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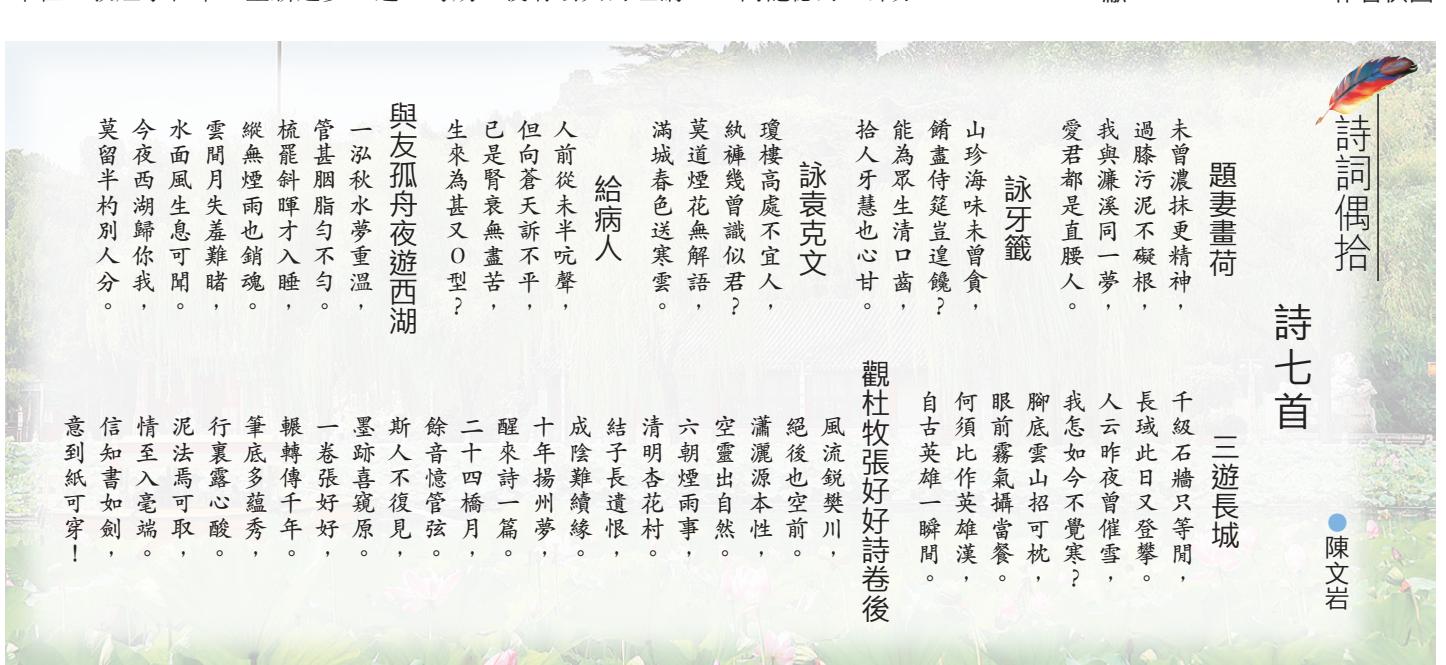
詩詞偶拾

● 陳文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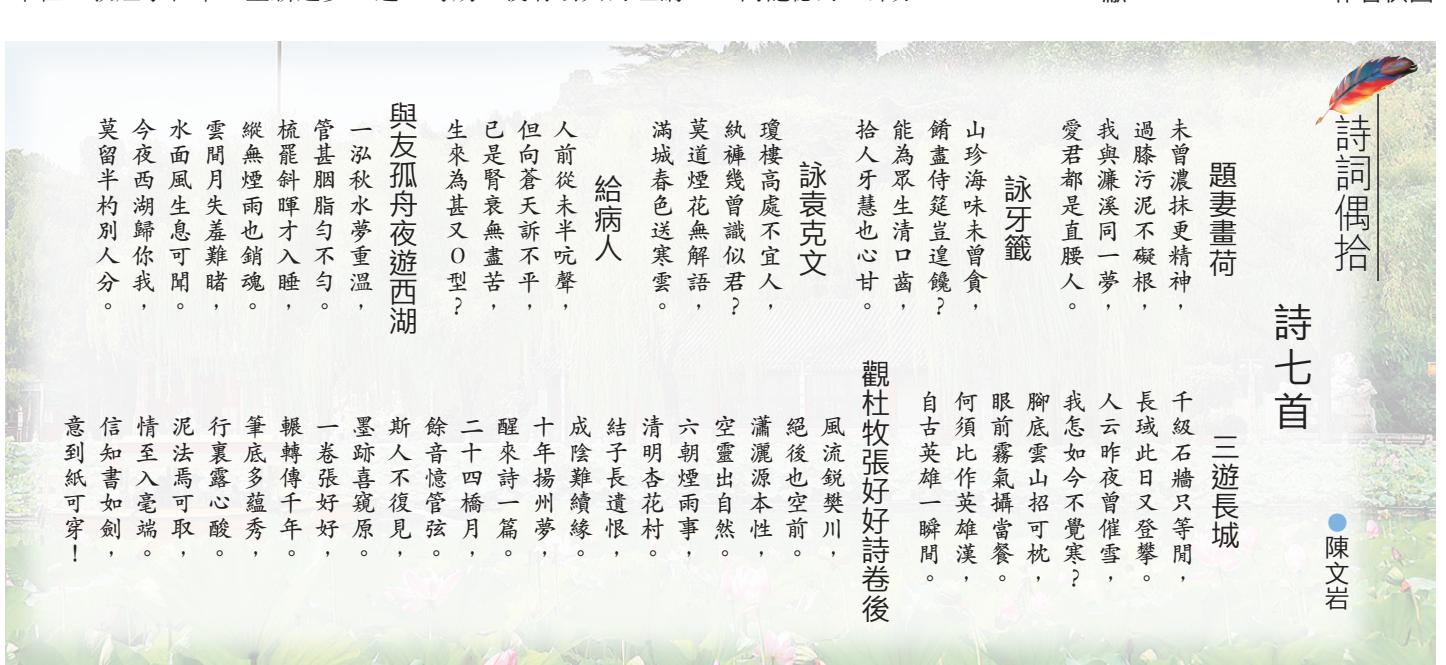
詩詞偶拾

● 陳文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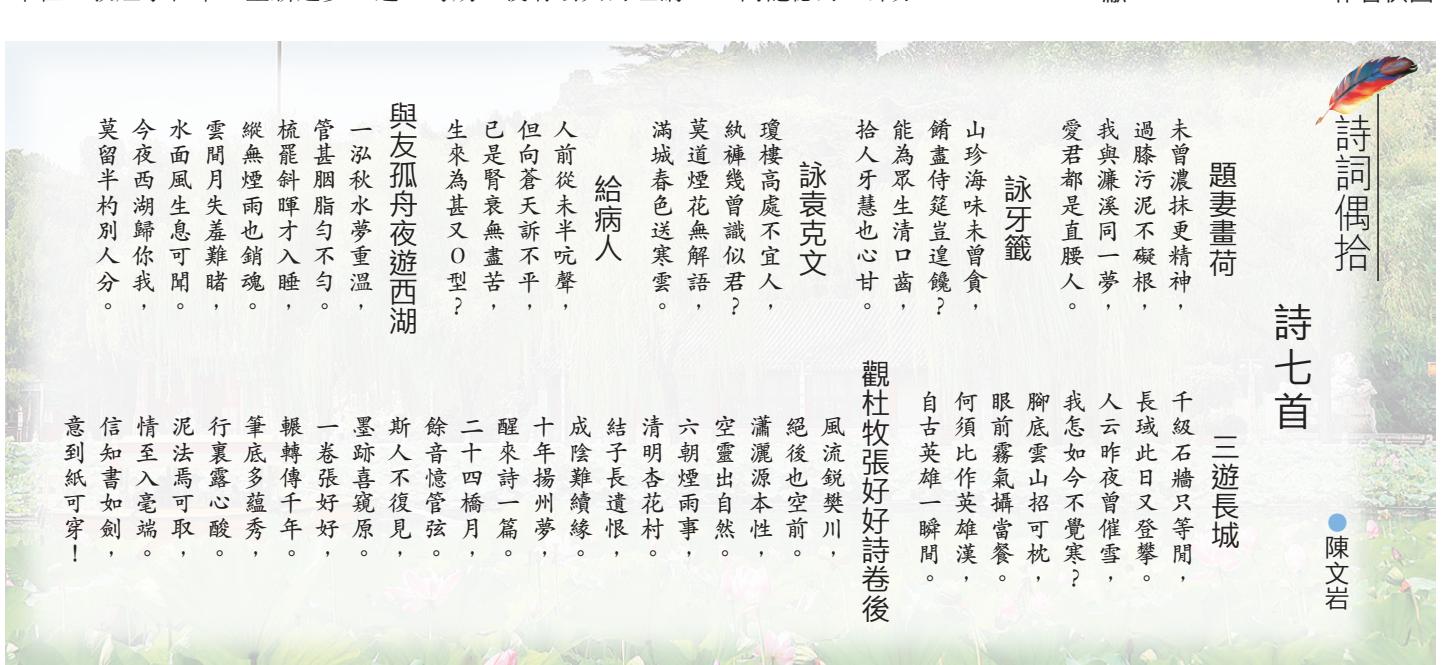
詩詞偶拾

● 陳文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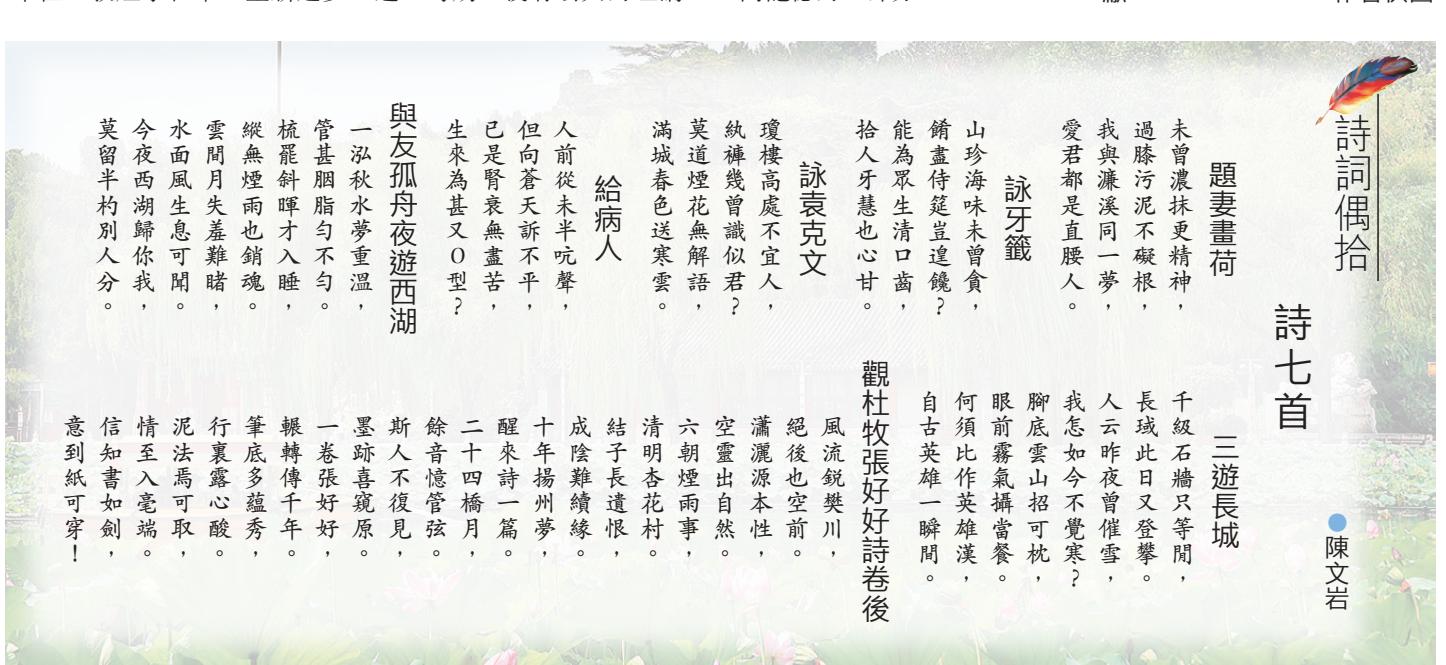
詩詞偶拾

● 陳文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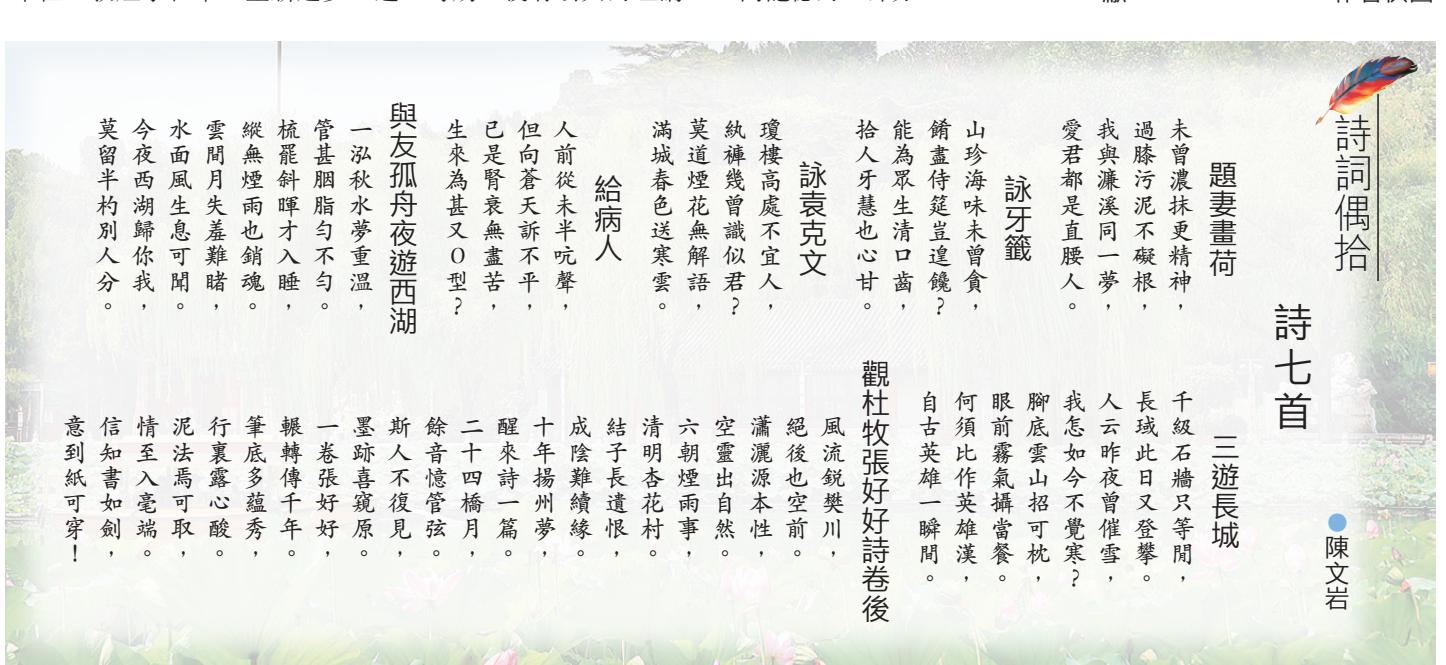
詩詞偶拾

● 陳文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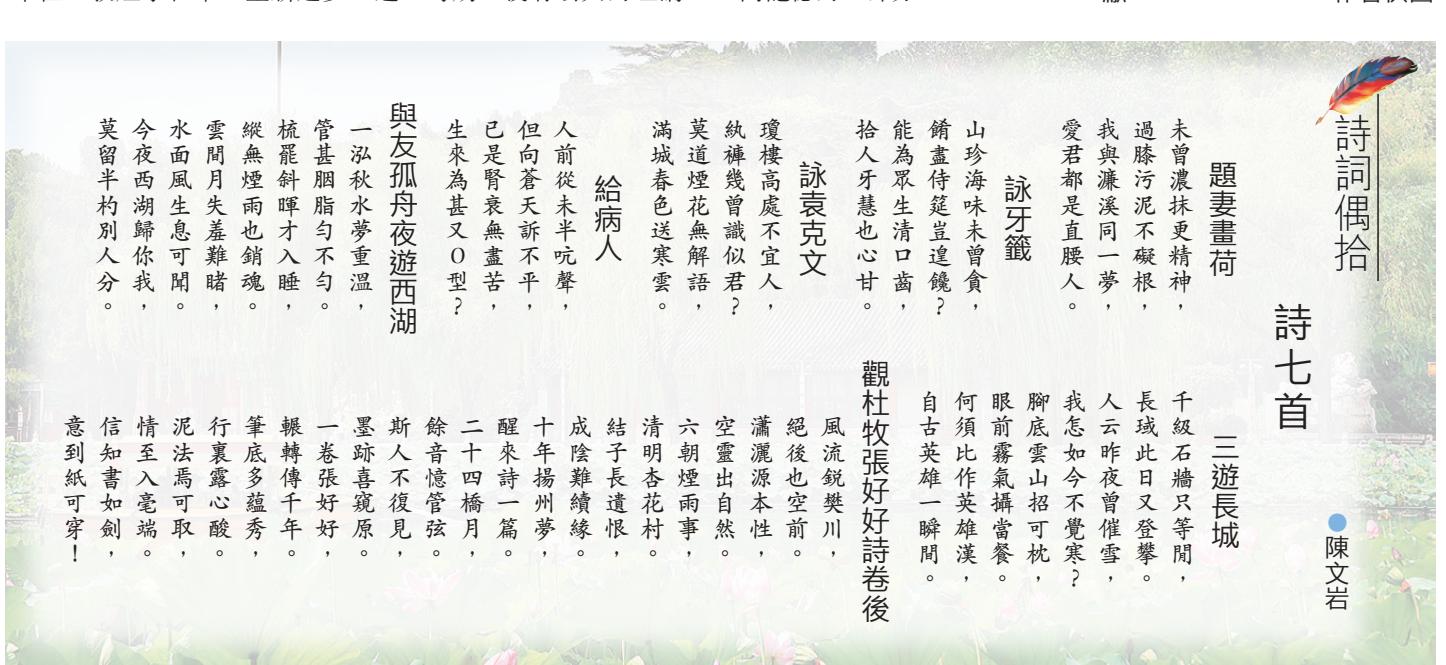
詩詞偶拾

● 陳文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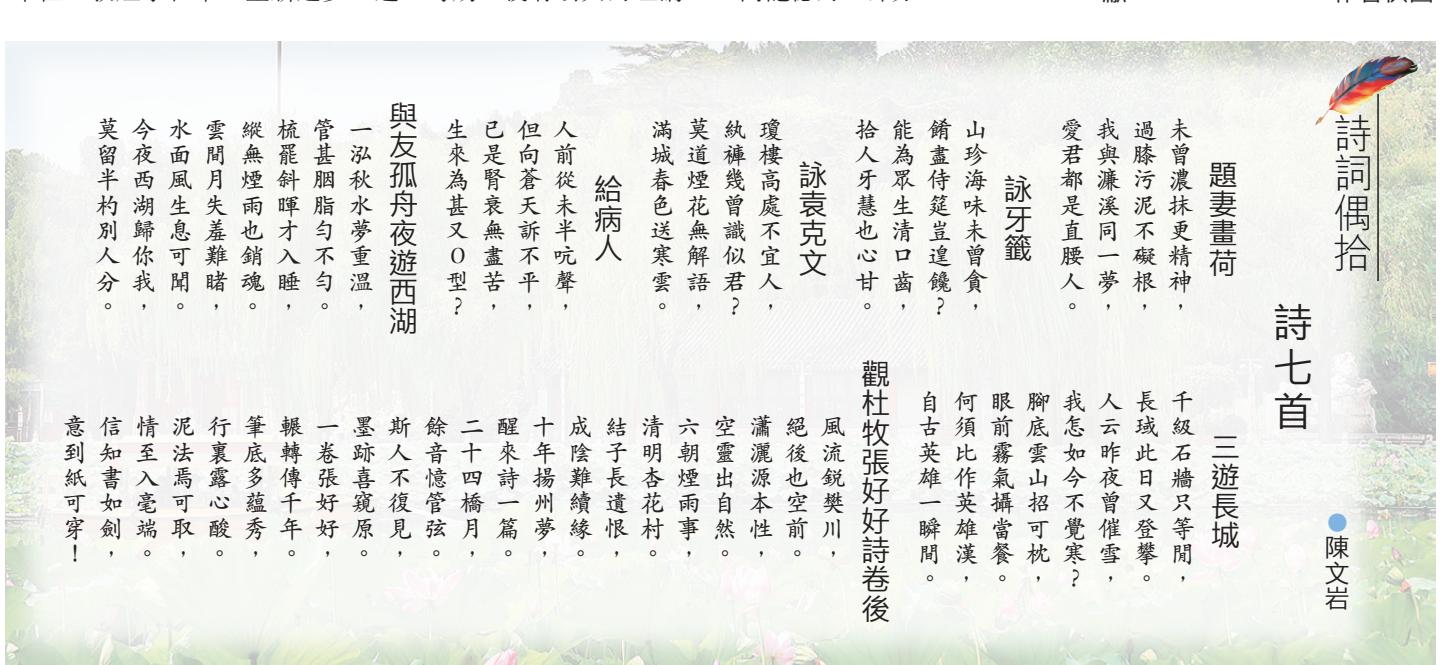
詩詞偶拾

● 陳文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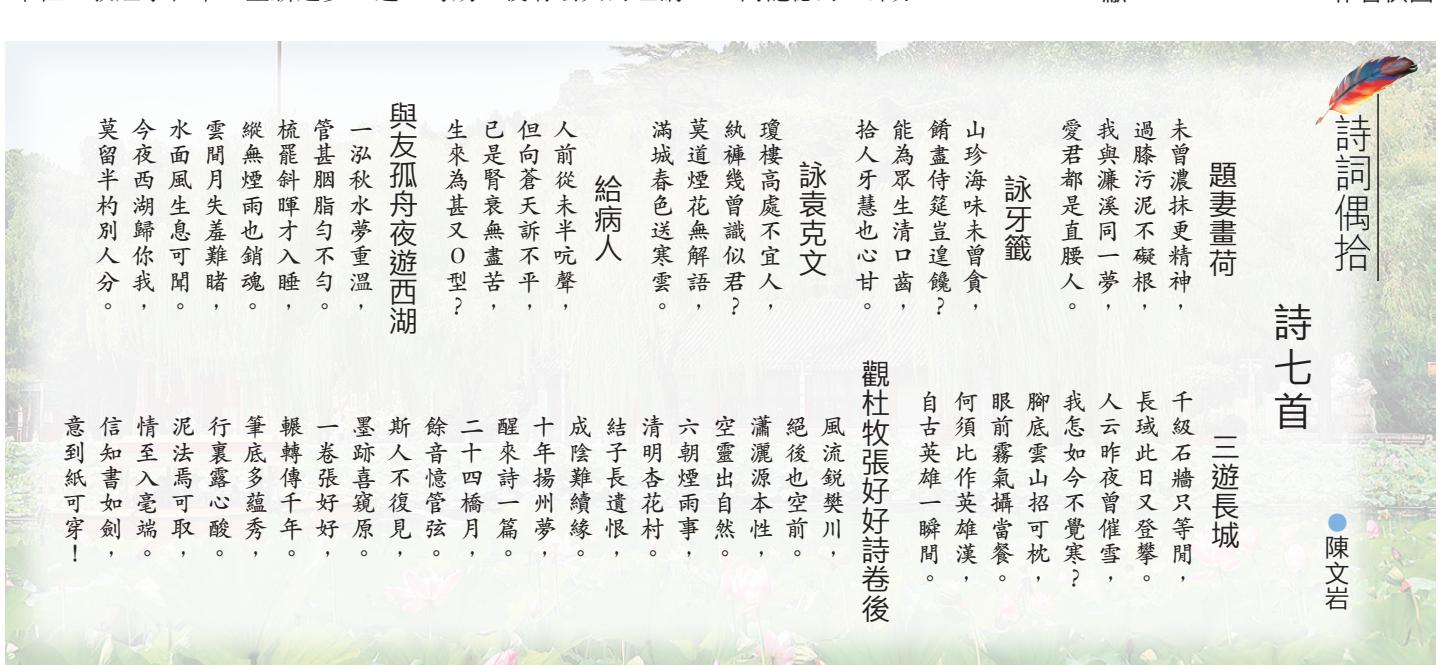
詩詞偶拾

● 陳文岩



詩詞偶拾

● 陳文岩



詩詞偶拾